

马戎：“去政治化”的政治

李乔杨¹ 龙晔生²

(1. 贵州民族大学 民社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 《民族论坛》杂志社,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马戎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系,并在如此国情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体系。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采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并非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表层上是避免把各族民众在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纠纷和价值冲突政治化,按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的原则处理;深层次的谋略是确保维护祖国统一、有效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一个方向,在没有得到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广泛认同前,不宜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在此期间,更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权益。

[关键词]族群;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反对民族分裂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592(2014)06-0048-05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解决和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问题是个基本的政治问题。为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很多途径,引发了很多论争。马戎教授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从2004年提出至今,已经连续十年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仅就马戎教授的“族群”概念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基本概念和由来做一简单陈述。

一、马戎的学术背景及学术观点

马戎,1950年生,回族,上海人,“文革”后不久,赴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当牧民,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之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87年就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2年以来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马戎教授长期以来以社会学的学科背景致力于民族关系、人口迁移、城市化及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对民族学产生影响的著作主要有《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和《民族社会学》,特别是2007

年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使马戎教授成为民族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文中指出,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关于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2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并非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他实际上是希望在民族问题的思维模式方面为我们的国家提出一种新的政策导向,希望改变传统的民族工作思路,防止一遇上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问题就过敏,就以“民族工作无小事”为标准上纲上线,把普通的公民之间的关系“都提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4XMZ00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1. 李乔杨,男,安徽广德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政治人类学等。

2. 龙晔生,男,湖南邵阳人,《民族论坛》杂志社社长兼学术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宣传等。

到‘民族关系’的高度来解读和处理。”同时,马戎也希望各民族国民不以民族身份去宣扬自己特殊的政治身份、不要凭借民族身份去谋求自己的特殊政治权益,更不要在心里还残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4]

他在2009年发表的《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凝聚”过程,不仅其主导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间存在动态转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

近年,民族理论研究领域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很多人把胡鞍钢提出的一揽子政策解读为马戎“去政治化”的具体方案。但马戎申明:“现在我考虑问题的角度不是马上需要具体去做什么事。”^[5]有人提出这是马戎思想观点变得温和的表现,其实这正是一个温和的民族社会学者一贯的思想和行为,为了一个长远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目标,执着独立思考和研究,为国家民族政策不断完善贡献力量。

二、关于“族群”及其有度的政治诉求

马戎教授对于民族学科概念的使用和重新考究不仅是出于学理的需要,也是现实国际学术交流使然。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基于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发展,马戎教授开始了对民族学领域几个基本概念进行探讨,即对“民族”、“族群”这两个概念使用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追本溯源。2004年马戎教授出版《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对此做出了详尽的阐述。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一些多族群大国。这些政权的创建,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兼并等直接途径,并配合以经济扩张、文化融合等间接手段,有时则是通过不同政权统治者之间的家族联姻建立起来。这些多族群大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以及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它们大多已在内乱或对外战争中先后崩溃。至20世纪后半叶,在历史上建立过多族群大国的国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继承了前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所统治的多族群政治实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

苏联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轰然解体,并波及和促使部分多族群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分裂。在此之后,西方政界、新闻媒体和学者们,都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乘势推进中国重蹈覆辙。针对这一严峻形势,社会学家马戎认真思考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长期存在并将继续统一的文化背景。

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华民族的各个族群就已开始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通过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各族群历经战乱迁徙和相互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不断融合与演变,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中国的各个族群“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在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延续了几千年、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这与沙皇俄国在短短二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从位于乌拉尔山西侧的一个内陆莫斯科大公国扩展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的征服兼并历程是不一样的。^[6]

马戎教授基于中国和苏联的“不一样”,首先对“民族”这个概念从学理的角度予以阐述,明确主张引进“族群”这一学术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概念强化开展民族工作,对“民族”这个概念的内涵未曾提出过任何的质疑,并且以一种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态度予以使用,从未想过会有任何动摇。

马戎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系,并在这样的本土国情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观念体系。在世界各地复杂变幻的人类社会中,不同地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出了本地的人文观念和社会范畴,各地的语言体系也形成了对本地各种社会现象和人文观念表达的方式和专用词汇。^[7]对于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那些表达方式和概念而言,想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词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由于东、西方国家不仅在空间上存在距离,在文化传递上也不同步,有关人文词汇的对译

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如,英语中的 nation 在我国一般译作“民族”,然而,在西方的文献中,“nation”常常与“state”(国家)的含义分不开。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就是民族的体现和象征,每个国家的人民将构建成为一个民族。而拥有多民族的国家,如果未能在社会演变中成功构建起国家民族,那么在民族自决机会出现时,民族就有可能提出分治要求,建立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一词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取得反封建专制的胜利。西方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民众普遍接受“民族国家理论”,大家都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独立战争而形成。越来越多的新型国家在建立中,这些国家又经历着建立新兴民族的过程,民族能否消亡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6]

马戎教授从 nation 和 ethnic group 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内涵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他指出,“民族”(nation)是与 17 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的,而“族群”(ethnic group)则出现于 20 世纪中叶,它指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和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亚文化群体”。其实,这个问题于 1990 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有学者指出:民族概念直接与国家概念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关联。从现在各国对民族一词的使用来看,往往更强调它的政治含义,也就是只对享有主权的民族才用这个词去指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那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能称作民族(nation)的,总共只有 200 来个^[6]。因此,马戎教授进一步指出,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族群”,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民族”之间虽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并非不可逾越。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族群”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那么,在国家认同意识和政治实体边界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7]

他认为“ethnic group”一词被翻译为汉文的“族群”是恰当的,这个概念的政治含义相对较少,更偏重于文化内涵,同时根据不同社区的具体情况,在

群体边界的界定上也更加灵活。他例举了外来移民人数较多的美国洛杉矶市的情况说明了这种思路体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自主性和群体边界的模糊性、可移动性。在洛杉矶市,除了人口众多的墨西哥裔之外,华裔、日裔、韩裔等都各自组成了自己的社区,被称为不同的“族群”(Chinese, Japanese, Koreans),而在亚裔人口稀少的美国中部城镇,华裔、日裔、韩裔等就共同组成“Asians”族群。

因此,他提出,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从中国大陆的“民族”话语如何与其他地区接轨的角度考虑,把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群体改称“族群”,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并顺应国内外发展潮流的思路。无论是考虑国内族群关系的长远发展还是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国际社会的交流,“族群”这个概念和名词都有多方面的长处,值得大陆学者和政府思考和借鉴。

而对于强调群体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族群”是不是也有政治诉求,马戎教授认为从国际社会惯用的阐述来看,“族群”的政治诉求与“民族”的政治诉求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族群”通常是在政治上保障本群体成员能够得到平等的公民权、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待遇以及群体特定的文化权利(语言使用、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它最本质的一点是反对族群歧视,这种“族群政治诉求”的代表性宣言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而“民族”(nation, nationality)的政治诉求一般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nationalism)色彩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和“民族独立”(national independence)。这种“民族政治诉求”典型地体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

中国本土的族类群体,具有崇尚中央正统、国家统一的传统,也具有长期中央间接统治族类群体本土化自主、自治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同时强调政治上的两个关切:国家统一、民族自主。可见,政治性是中国族类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初便确定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尊重这两种传统或者说是尊重事实。马戎教授认为,我们若能在核心概念上做些调整,把维、蒙、藏等群体改称“族群”,那这是一个从根子上与这些政治议题脱钩的新思路。他提出了两个应该考虑的关键问题:如果把 56 个“民族”这一层改称“族群”,那么,我们的少数民族将会失去些什么?又将会得到些什么?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想清楚了,那么我们最后的理性选择应该是

什么,也就很清楚了。^[9]

三、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路径预设

2004年马戎教授在《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中提出:多民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但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欧洲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然而,随着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变化以及全球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2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逐渐将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政治化”趋势转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10]马戎教授从“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概念涵义入手,论述了族群关系的两种政策导向,一是政治化,一是文化化,并对“族群”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予以追根溯源,纵横捭阖地指出政治化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指出理想的国家民族框架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近十年来,马戎教授一直在论证这个命题。2013年6月,在青海民族大学民社学院与该学院师生进行了两天的讨论,主题是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社会学思考,对“去政治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马戎所说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实际上是在民族问题的思维模式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政策导向,并不是说民族关系不具有“政治”的内涵。“我之所以提出民族‘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希望全国各族精英和民众都能够思考一下我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大方向和未来的发展结果。我觉得民族群体之间,目前不断发展的权力与利益博弈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全体国民的平等与公正。”^[11]事实上各族干部民众普遍关心的群体平等、政治权益、政策优惠、文化保护等议题都具有政治意义。马戎只是希望能够把目前我国56个“民族”群体各自身份和“民族”互动中自带的“政治色彩”在未来能够逐步淡化,希望我国各“民族”都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国其他各族国民不同的具有独立政治身份、具有特殊政治权益和享有特定政策优惠的特殊人群,希望大家不要总是从“政治博弈”、“地域区隔”、“权力划分”、“利益冲

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历史偏见和对“民族”的本质主义思维带到21世纪,从而破坏了中华民族密切合作、共同繁荣的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马戎认为我国各族民众之间面临的许多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必须有相应的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司法、社会参与等)的具体政策。我国传统的民族工作往往更多的是采用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特别是把涉及到不同民族成员的问题(治安事件、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习俗差异等)都提高到“民族关系”的高度来解读和处理。“民族工作无小事”,凡是涉及到少数民族成员,政府机构就认为需要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来处理。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在遇到各种非政治性问题时,也把这些问题的“政治化”,试图通过“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寻求解决。而由汉族干部主导的各级政府遇到这类事件时,也习惯地把这些问题视为特殊的“民族问题”,采用特殊的、非常规的“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处理,忽视了非政治领域那些处理专业问题的专业性措施,甚至有时把一些全国统一的法规和规章制度也放在一旁,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特殊的民族问题”。马戎指出如“天价切糕”事件,“这类现象都可以说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政治化’的重要表现。而‘去政治化’所强调的,就是在非政治领域要用非政治的、相应的专业手段来处理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戎教授的观点提出“去政治化”的思路是因为辩证的看待我国的民族政策,即曾经具有进步性,长期以来受到各族群的欢迎,但局限性日益显现。其中,民族识别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区域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族融合,而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模式强化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忠诚,相对弱化了必要的国家忠诚。^[12]为此,马戎教授列出了一个“药方”,用“族群”代替“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这些观点一直以来在民族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质疑。但我们发现,很多民族工作者甚至部分学者并没有真正了解马戎的学术主张与理论观点。

笔者认为:马戎教授的这些观点同现在的主流观点并无二致,并不违背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反而更加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最优秀地创举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建立了新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征途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马戎教授理论观点最具说服力之处就是他敢于面对现实实践,提出一种与主流思潮存在一定分歧的修正方案。同时,马戎教授的社会学专业背景也为其研究民族学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依据客观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抽象的政治理论和政府的宣传文件出发。社会学家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时使用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和自己与社会中各类人群交往时的切身感受。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家们不仅要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社会现象,还必须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因素,努力对其在短时间和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做出预测。^[12]

学人们在探讨问题时都体会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一种境况。假如我们能够抽身出来,换一种思考的方式,寻找另一种途径,如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民族问题不失为一种很新颖的途径。民族问题研究学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如果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仍然停留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框架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还不够解放,研究中使用民族基本理论主要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就

难以提出新的思路 and 观点。^[13]对民族研究的反思,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杨昌儒教授指出,“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使民族理论学科建设步伐非常缓慢。面对世界范围内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国内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民族宗教领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与研究方法显得陈旧与老套,造成与其他学科沟通的困难。”当今世界,只要是存在“世居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分裂思潮和运动都或隐或现地存在。这是由于民族自觉仍在发生,“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念还在支配着这种自觉,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还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自觉造成的。^[14]尽管居住在繁荣自由的国家,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佛兰德人、苏格兰人和魁北克人的独立运动却非常强大。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民主还是军人政权的国家,无论在富国还是在穷国,民族分离的威胁无处不在。”^[15]

前不久,英国爱丁堡大学巴纳德教授来贵州民族大学访问,笔者专门问及苏格兰今年9月即将公投的事情。他也坚持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坚持认为,苏格兰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正式的场合,还是私下交流的时候,提及的皆是苏格兰的历史与文化,而非联合王国的事情。乌克兰问题的爆发内乱持续,打乱了欧亚结合部的局面。这些问题的爆发和持续发酵不能不发人深省。马戎教授学术思考的深层关怀是:我们必须把许多问题在理论上想清楚,有许多预案在头脑里。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16]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有些地区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发酵,我国周边并不安宁。对此,我们应该有一颗清晰的头脑,应该予以祖国前途命运以理论关怀。毫无疑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路径预设是学术探讨的理论之一。

[参考文献]

- [1] 马戎.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问答与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 2014(01).64:65.
[2] 凤凰大学问.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谈中国可能会走向何方[Z].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2014-3-30)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minzu/> 访问日期:

2014.06.20.

- [3] 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4] 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5] 休·希顿—沃森著,吴洪英等译.民族与国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

(下转第66页)

- [30] 王希恩.全球化与族性认同[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 :1-7.
- [31] 王希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8.(3) :1-9.
- [32] 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及走向[J].民族研究,2000.(6) :8-16.
- [33] 王希恩.深刻理解“和谐”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重要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8) :12-14.
- [34] 王希恩.科学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必由之路[J].民族研究,2007.(6) :5-7.
- [35] 王希恩.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J].满族研究,2003.(2) :1-12.
- [36] 王希恩.关于民族精神的几点分析[J].民族研究,2003.(4) :1-11.
- [37] 王希恩.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J].世界民族,2003.(4) :9-16.
- [38]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1) :1-17.
- [39] 王希恩.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55-58.
- [40] 王希恩.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J].民族研究,2010.(5) :1-15.
- [41] 王希恩.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J].民族研究,1997.(5) :1-8.
- [42] 王希恩.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职能[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 :1-6.
- [43] 王希恩.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三个生长点[J].满族研究,2002.(3) :3-8.
- [44] 王希恩.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J].科学社会主义,2010.(2) :8-12.

(责任编辑 觉理)

(上接第 52 页)

- [6]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13.
- [7]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11).
- [8] 马戎.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Z].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dongtai/detail_2014_03/20/34977535_0.shtml
- [9]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6).
- [10] 马戎.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问答与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4(01).
- [11] 重启“中华民族”新的大融合[Z].光明网,
http://theory.gmw.cn/2014-06/01/content_11484139_3.htm.
- [12] 马戎.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问答与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4.(01).
- [13]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3).
- [14]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01).
- [15] 威尔·金里卡著 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0.
- [16] 凤凰大学问.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Z].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2014-3-30)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minzu/> 访问日期:2014.06.20.

(责任编辑 王晓艳)